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35

2009年6月25日

\*\*\*\*\*

## “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姻”？（下）

### — 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1946~1961）

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 沈志華

#### 七、在停戰時機問題上的意見分歧

朝鮮戰爭歷時三年，但是從1951年7月至戰爭結束，打打停停，多一半時間都是在停戰談判中度過的。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中朝雙方在停戰時機的問題上，也是分歧不斷，爭論不休。

第五次戰役以後，中國方面終於感到戰爭難以繼續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決定採取“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的方針。<sup>1</sup> 金日成則表示反對戰爭長期化的打算，要求中朝聯軍6月末至7月中對敵發動再一次總攻。毛澤東請金

---

<sup>1</sup>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第741~742頁。

日成於6月3日抵達北京進行商議。經過商談，金日成同意6~7月不發動進攻，但還是要求經過準備在8月發動一次反攻。<sup>2</sup> 毛澤東只好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sup>3</sup> 他們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後，於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彙報，接受了停戰談判的意見。斯大林也來電表示，“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sup>4</sup>

據蘇聯大使觀察，“朝鮮領導人對於停戰談判有些戒心，儘管他們沒有公開和直接地表達出來”。金日成回到朝鮮後，心情十分沮喪，認為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馬立克（Malik）1951年6月23日呼籲停戰談判的發言“是中國力圖達到停戰和擺脫援助朝鮮這一負擔的最明顯的表示”，甚至在馬立克發表聲明之後的幾天時間裡，北朝鮮的報界以及其他宣傳機關，對此都“沒有進行詳細的解釋，也沒有發表任何評論文章”。雖然朝鮮領導人後來也“認識到了締結停戰協定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們認為中國代表團（主要是其負責人李克農）為能達成停戰協定而對美國人過分寬容和讓步，同時也抱怨中國人在談判過程中沒有及時地、充分地聽取朝鮮代表的意見。特別是當7月27日毛澤東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國人堅持將現有的前線作為分界線的話，那麼中國人認為可以向美國人做出讓步時，金日成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他立即答復說：“這種讓步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意味著對朝鮮的“嚴重政治打擊”。金日成甚至對朴憲永說：“我寧願在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下繼續進行戰爭，也不願意做這種讓步”。後來因美國代表在分界線問題上提出了過分要求，並在談判中立區進行

---

<sup>2</sup> 金日成致彭德懷電，1951年5月30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51年6月11日。

<sup>3</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23, 28~29。

<sup>4</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31~32。

挑釁，中方表現出強硬立場，才使朝鮮人的情緒有所好轉。不過，拉祖瓦耶夫注意到，“最近數月來，朝鮮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明顯地冷淡了，朝鮮人更加堅定了依靠蘇聯的方針”。<sup>5</sup>

然而，中朝雙方對談判的態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鮮戰場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時，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卻陷入了僵局，問題竟膠著在毛澤東起初認為最容易解決的戰俘問題上。<sup>6</sup>此時，毛澤東主張把戰爭繼續下去，而在和平談判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但朝鮮方面卻希望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儘快在停戰談判協定上簽字。斯大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再次支持了毛澤東。

1952年2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協議：在簽訂停戰協定後90天內召開相關國家的政治會議解決朝鮮問題，但在其他議程，特別戰俘問題上還有爭議。這時，朝方主張儘快結束談判，金日成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sup>7</sup>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報告說：“金日成在與南日(Nam Il)討論談判陷入困境的原因時表示了這樣一種看法：應該建議簽訂停戰協定，而把所有未解決的問題移交給政治會議去研究。金日成認為拖延談判是不利的，因為美國的空軍正在繼續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造成慘重的損失。他看不到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麼合理性，因為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金日成還認為，中國志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

---

<sup>5</sup>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1022~1026頁。

<sup>6</sup> 至少到1951年11月中旬，毛澤東仍然相信有關戰俘問題不難達成協議（見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6~19）。

<sup>7</sup>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81~83。

楚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並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拉祖瓦耶夫還反映，中國領導人“擔心大量蘇聯軍備的供給會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而減少或中斷”，並認為匆忙地解決問題，“只能相反地導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農認為，如果不發動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如果不作長期鬥爭的準備，那麼美國人是不會做出讓步的。毛澤東同志也是這樣判斷談判前景的，毛澤東給李克農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只有堅持鍥而不捨、堅定不移的立場，你們才能贏得主動權並迫使敵人做出讓步。為了在談判中實現這一目標，你們應該準備與敵人再作幾個月的較量”。<sup>8</sup>

1952年5月2日，朝鮮停戰談判五項議程中的四項已經全部達成協議，但在第四項議程，即關於戰俘安排問題上，美國方面提出了自願遣返的原則，而中國方面堅持應全部遣返，雙方的談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鮮領導人原指望不晚於5月份與美國人簽訂停戰協定，並依此來計劃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沒想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而拖延下來，“這使朝鮮領導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議中國同志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並爭取簽訂停戰協定”。<sup>9</sup>或許是考慮了朝方的意見，7月3日，中朝代表團提出了新建議，除了非朝鮮籍戰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鮮籍戰俘無須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敵對方的朝鮮籍戰俘應返回敵對方領土；在應召入伍前居住於俘獲方領土上的朝鮮籍戰俘，應全部留在原處並應被釋放遣送回家”。<sup>10</sup>但是美國方面不顧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讓（包括

---

<sup>8</sup>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一季度工作報告，轉引自Волохова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 №2, с.104。

<sup>9</sup>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二季度工作報告，轉引自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с.104。

<sup>10</sup>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1182~1183頁。

已不再堅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員），於 7 月 13 日提出了總共遣返 8.3 萬人（包括人民軍被俘人員的 80% 和志願軍被俘人員的 32%）這個基本數字，並聲稱這是最後的、堅定的、不可改變的方案。<sup>11</sup> 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後選擇。

對此，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十分堅決。毛澤東在 1952 年 7 月 15 日給金日成的電報中說，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引誘性而並非真正讓步的方案，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愈戰愈強，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了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使美國的主要力量陷在東方繼續遭受損失，而蘇聯的建設得到了加強並影響著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因而也就推遲了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保證，中國人民願盡一切可能幫助朝鮮人民解決困難。總之，“在現時形勢下，接受敵人這一方案必然要長他人志氣來滅自己威風”。最後，毛澤東不無用意地告訴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針，在徵求了斯大林的意見後再告訴平壤。<sup>12</sup> 同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中國主張堅決拒絕“敵人這種挑撥性和引誘性方案”，並表示準備戰爭擴大。毛澤東還通報說，“金日成同志對此有不同看法”。<sup>13</sup> 儘管金日成在回電中表示贊同毛澤東對當前局勢的分析，並感謝中國將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諾，但在同一天給斯大林的電報中，金日成抱怨說，由於消極防禦的方針，敵方轟炸給朝鮮的城市和平民帶來了極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拒絕接受敵方的條件。雖然他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還是希望儘快停戰：“我們必須堅決力爭儘快簽訂停

---

<sup>11</sup>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 249~250 頁；關於美國對停戰談判策略的轉變及其原因，詳見沈志華：〈對日和約與朝鮮停戰談判〉，《史學集刊》2006 年第 1 期，第 66~75 頁。

<sup>12</sup>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 4 卷，第 289~290 頁。

<sup>13</sup>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第 280 頁。

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並使我們從被動的局面中擺脫出來。”<sup>14</sup>

中朝之間在談判中的戰俘問題上持有不同立場，除了政治上的考慮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實際的原因，即雙方的戰俘政策完全不同。由於受國內戰爭傳統作法的影響和缺乏國際鬥爭經驗，中方從一開始就未曾想過扣留戰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懷致電軍委，擬在戰役發起前釋放一百名戰俘，以動搖敵人軍心。18日毛澤東復電，“釋放一批戰俘很對。今後對戰俘應隨時分批放走，不要請示。”<sup>15</sup> 這樣，中方掌握的戰俘即相應減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為便於釋放戰俘工作，以後南朝鮮戰俘交由人民軍管理，而志願軍只管理其他國家的戰俘。<sup>16</sup> 這樣，中方實際看管的戰俘人員十分有限，沒有多少談判的本錢，這大概也是中國主張“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於戰後經濟建設需要勞動力的考慮，則暗地裡扣留了大量戰俘。據蘇聯大使蘇茲達列夫的報告：“朝鮮同志認為將大量的南朝鮮的戰俘扣留下來，讓他們在北朝鮮從事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比較好，而無須去考慮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鄉的願望”。因此，他們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軍隊的戰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軍中服兵役，其餘的人則在內務部和鐵道部從事不同的工作。此外，還扣留了戰爭前期從南朝鮮被“動員”加入人民軍的42262人——北朝鮮認為這些人不是戰俘。<sup>17</sup> 在這種情況下，朝鮮領導人當然不可能理直氣壯地堅持“全部遣返”的原則。

---

<sup>14</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8, л.72~75、65~68。

<sup>15</sup>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449頁。

<sup>16</sup> 參見《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第242頁。

<sup>17</sup> 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с.106、108。

問題最後還是在莫斯科得到解決的。1952年7月15日毛澤東電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兩者比例極不相稱，敵人企圖以此來挑撥朝中人民的戰鬥團結”。“在敵人的壓力下屈服，對我極為不利”，並表示即使談判破裂，也絕不讓步，“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sup>18</sup> 第二天斯大林即復電：“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sup>19</sup>

周恩來隨後於1952年8月訪蘇，並與斯大林舉行了多次會談。中途趕來的金日成、朴憲永和彭德懷參加了後期會談。除了討論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外，會談的重點在於確定以後戰爭的方針。周恩來介紹了戰場上中朝力量的情況，認為“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並且因為建立了堅固的坑道工事，也經得住轟炸”。關於戰俘問題，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國人想按自己的主張解決戰俘問題，而根據國際法，交戰各方必須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戰俘。斯大林問，毛澤東對戰俘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是讓步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周恩來簡要地介紹了在這個問題上中朝之間存在的分歧，並表達了毛澤東“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看法。周恩來說：“朝鮮人以為，繼續打下去不利，因為每天的損失要超過在遣返上有爭議的戰俘人數，而停戰對美國不利。毛澤東則認為，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斯大林當即肯定說：“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美國意識到，這場戰爭對他們是不利的，必須結束它，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仍有我軍駐在中國以後。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還提出了一個更能觸動中國領導人神經的問題，他提醒周恩來說：“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志必

---

<sup>18</sup>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250頁。

<sup>19</sup>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69。

須瞭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麼中國永遠也收復不了臺灣。”關於解決戰俘問題的具體方法，周恩來談到，如果美國人做出某些讓步，那麼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繼續談判，第一，在美國仍然堅持遣返部分戰俘的情況下，宣佈扣留同樣比例的美韓戰俘；第二，戰俘問題交給中立國（如印度）進行調解；第三，先簽訂停戰協定，戰俘問題留待以後解決。在交談中，斯大林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來重點談的是第二方案。不過，他們一致贊同的前提是首先堅持全部遣返戰俘，並要美國先行表示讓步，而不能在美國的恐嚇面前退縮。<sup>20</sup>

對於平壤的說服工作，自然還要莫斯科出面。在1952年9月4日與金日成會談時，斯大林問到，朝中之間在談判問題上是否存在某種分歧。金日成回答：“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上的分歧。我們同意中國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於朝鮮人民目前處於的嚴重狀況，我們更願意儘快締結停戰協定。”斯大林立即說：“我們在此已經與中國代表團討論了這一問題，並表達了這樣的建議：不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於戰俘問題的條件而堅持自己的條件”。“如果美國人不願意遣返20%的中朝戰俘，……那麼他們的那20%的戰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們不再扣押中朝戰俘為止”。斯大林最後以肯定的語氣結束

---

<sup>20</sup>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1995~1204、1227~1232頁。日本學者和田春樹的看法不同，他認為1952年周恩來訪蘇時，朝鮮要求停戰，蘇聯也想停戰，但中國不願停戰，斯大林只好同意周恩來的意見（見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45~1953”，*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January 1996）。但作者沒有為這種說法提供檔案依據。美國學者馬斯特尼持有另一種筆者不能同意的看法，他認為周恩來去蘇聯是要表達中國和朝鮮企求停戰的願望，而斯大林堅決反對。他甚至認為兩個月後劉少奇去莫斯科參加蘇共十九大也是為了勸說斯大林實現停戰（見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第147~148頁）。這裡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正確理解周恩來講話的含意。



了這一話題：“這就是我們對此問題的看法”。<sup>21</sup>

此後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沒有再提立即停戰的主張，而是關注於如何更多地取得蘇聯援助物資的問題。不過，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中朝之間在是否立即簽署停戰協定的問題上又發生了分歧，這也是戰爭期間的最後一次爭論。1953年3月以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戰爭方針發生改變，從而促進了朝鮮停戰談判的進程。<sup>22</sup> 但李承晚不想停戰，並以擅自釋放戰俘的做法破壞協定的簽字。為此，中方主張再發動一次戰役，藉以爭取更好的停戰條件。而朝方則要求馬上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對李承晚釋放戰俘的行為不必追究。彭德懷沒有理會金日成的主張，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願發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陣地突破戰，並取得成功。<sup>23</sup>

顯然，在停戰問題上，金日成考慮的是朝鮮的實際利益：既然無望在戰爭中取勝，那麼最好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儘早結束戰爭，轉而進行經濟建設，鞏固其對北朝鮮的統治。而毛澤東因其對亞洲革命負有的領導責任，則必須著眼於兩個陣營之間對抗的總體形勢，著眼於社會主義陣營在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間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才屢屢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在朝鮮戰爭期間和以後許多年，被中朝雙方大力渲染的“鮮血凝成的友誼”和“唇齒相依”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宣傳。中朝結成同盟關係乃是雙方對他們共同的實際利益考慮的結果，這是他們之間的一致性，也是同盟的基礎。當然，他們各自的利益之間也有很多矛盾存在，並由此產生了重大分歧。但這些矛盾和分歧，既不能讓兩國人民瞭解，更不能讓他們共同的敵人獲知。否則，這一同盟對內

---

<sup>21</sup>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解密文件》，第1214~1221頁。

<sup>22</sup>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388~414頁。

<sup>23</sup>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第352頁。

就失去了合法性，對外則不再有任何威攝力。不過，隨著國際局勢趨向緩和，平壤的不滿和反抗便漸漸顯示出來。

## 八、朝鮮勞動黨八月事件與中共立場的變化

朝鮮停戰以後，儘管在 1954 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參戰各方未能就結束戰爭達成一致意見，但是也沒有人想要在東北亞重新挑起武裝衝突了。<sup>24</sup> 戰爭的硝煙散去後，朝鮮面臨的經濟恢復和建設的嚴峻局面絲毫不亞於戰爭本身。

據 1954 年 3 月蘇聯駐朝鮮使館根據朝鮮中央統計局資料撰寫的備要報告，在戰爭期間，朝鮮遭受了特別嚴重的損失。人口銳減近 120 萬，造成勞動力嚴重緊缺。直接經濟損失達 4200 億朝元，有近九千座工業建築、60 萬所住宅、五千所學校、一千家醫院、263 座劇院和電影院以及數千其他文化生活機關變成廢墟。一些最重要的工業產品產量急劇減少：電力生產從 1949 年的 59.24 億度下降到 1953 年的 10.16 億度，相應地，採煤量從 394.3 萬噸減少到 68.8 萬噸，鋼從 14.4 萬噸減少到 0.35 萬噸，水泥從 53.7 萬噸下降到 2.65 萬噸，等等。農業損失也很嚴重，除大量農作物被毀外，被宰殺和被掠走的牛羊 10.9 萬頭，豬 13.5 萬頭，毀壞果樹 8.9 萬棵。<sup>25</sup> 在這種情況下，平壤能夠指望的，還是莫斯科和北京。

為了幫助朝鮮的經濟恢復和建設，蘇聯和中國提供了大量援助。根據蘇聯外交部遠東司的調查報告：蘇聯政府根據 1953

---

<sup>24</sup> 關於日內瓦會議的最新解密檔案，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一集）：1954 年日內瓦會議》，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6 年。

<sup>25</sup> 韓國國防部軍史編纂研究所編：《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拉祖瓦耶夫關於六·二五戰爭的報告書》，（韓國）韓國國防部軍史編纂研究所印行 2001 年，第 34~53 頁。

年 9 月 19 日的蘇朝協議，在兩年內向朝鮮提供無償援助十億盧布；對戰前和戰爭期間提供的貸款（2.98 億盧布）延長了還貸期（1957~1966 年），降低了利率（從 2% 降為 1%）；把戰爭期間的非貿易支付債務（7288.8 萬盧布）減少了一半。中國對朝鮮的援助力度更大，在四年內（1954~1957 年）提供無償援助八萬億元（合 16 億盧布）；從戰爭開始至 1953 年底提供的援助全部免於償付，總計 7.29 萬億元（合 14.5 億盧布）；在三年內負責收養 22735 名居住在中國東北的朝鮮孤兒，並承擔對這些兒童進行教育的朝鮮公民及其家庭成員（31338 人）的全部費用。除以上經濟和文化協議外，根據 1953 年 11 月 23 日簽訂的其他協議，在中國專家的待遇和費用以及朝鮮實習人員和留學生的費用等方面，中國的條件也比蘇聯更具優惠性。以至遠東司建議應效仿中國的做法，減少向朝鮮收取的專家費用。<sup>26</sup> 儘管如此，朝鮮對蘇聯和中國的疑慮依然存在，在蘇共二十大以後，甚至還有加重的趨勢。

從 1954~1956 年，中共和蘇共從外交（主張和平共處）到內政（調整經濟結構）都採取了比較一致的立場，並且希望各國共產黨都能執行這一總方針。<sup>27</sup> 然而，由於面對美國的直接威脅，這一方針在朝

---

<sup>26</sup> 費德林的調查報告，1953 年 12 月 31 日，ABIPФ, ф.0102, оп.7, д.47, л.27, л.115~120；《人民日報》1953 年 11 月 24 日，第 1 版。參見中朝互換〈中朝經濟文化合作協定〉批准書的來往電報（1953 年 12 月至 1954 年 1 月），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7-00125-01，第 3~14 頁。

<sup>27</sup> 詳見沈志華：〈毛澤東、赫魯曉夫與 1957 年莫斯科會議〉，《歷史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82~109 頁。英文稿即將刊出：“Latent Anxiety on the Honeymoon: Mao Zedong, Khrushchev and the 1957 Moscow Conference”（accepted and forthcoming with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至於“和平共處”方針在亞洲推行的典型事例，應說到蘇共中央和中共中央 1954 年 10 月給馬來亞共產黨的聯合電報。在這封電報中，馬共被要求放棄武裝鬥爭的方式（參見李丹慧、沈志華對萬家安等原馬共幹部的採訪（2007 年 6 月），及萬家安：〈“蘇中與中共聯合書面意見”與馬共路線〉，《東方文薈》2006 年 8 月 6 日）。

鮮卻受到明顯的抵制。蘇聯駐朝使館注意到，在 1955 年 1 月 31 日朝鮮勞動黨通過的關於黨和國家現階段基本任務的指南性文件中，沒有按照莫斯科的意見致力於和平統一，而仍然把“解放南朝鮮人民”和“消滅南朝鮮親美、親日地主集團”作為實現祖國統一途徑。<sup>28</sup> 金日成對莫斯科新方針的不滿更主要地表現在他的內部談話中：“我們要改變一味模仿蘇聯的做法”，“蘇聯人沒有直接與美國人交戰，他們可能希望與美國人和平共處，但是美國人佔據著我們的南部，這是令所有朝鮮人民心痛不已的事”。<sup>29</sup> 在 1956 年初的朝鮮勞動黨黨章草案中，繼續反映出這種傾向，以至蘇聯使館不得不對此提出修改意見：刪除原文中“美國的”和“親美的”以及“從軍事上加強革命民主的基礎”等詞語，以免“授人以柄”，“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即朝鮮勞動黨為自己所確定的任務是帶有軍事性質的”。<sup>30</sup>

在經濟建設方面，朝鮮的核心政策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依靠中蘇的幫助，到 1955 年初，朝鮮三年計劃所確定的工業總產量目標已提前兩年超額完成，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卻沒有任何提高。尤其是在農業方面，戰前的糧食生產完全可以自給，現在超過 30% 的農民無法養活自己。為彌補糧食不足，朝鮮不得不從中國大量購進糧食，1953 年 20 萬噸，1954 年 13 萬噸，1955 年預計 17 萬噸。被戰爭破壞的居民住宅到 1954 年底只修復了約 70%，大部分城市居民和 30% 的農民還生活在簡易的臨時建築裡。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除了在投資比例上過於偏向重工業外，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則是一味追求國有化和合作化。允許私人貿易和家庭手工業在國家監控下的合理存在，本來是消費品生產和流通的必要手段，但朝鮮領導人卻在執行徹底消除

---

<sup>28</sup> 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6 日，ЦХСД, ф.5, оп.28, д.314, л.12~15。

<sup>29</sup> 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第 125~126 頁。

<sup>30</sup> 蘇茲達列夫致謝爾巴科夫函，1956 年 3 月 5 日，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22~25。

私有資本的路線上陷入了死胡同。私營企業 1949 年佔工業企業的 15%，到 1954 年就縮減到 2.5% 以下，1955 年的計劃是降到 1.3%。私營資本在貿易中的比重也從 1949 年的 46.8% 降到了 1954 年的 22.8% 以下，還有近 90% 的私人餐館關門，致使相當大一部分城市居民失去了謀生手段。在農業合作化方面，破壞了農民自願加入的原則。1954 年 1 月確定在農村試行合作化，當年便成立了一萬個合作社，迫使 32% 的農民加入了合作社，造成 1954 年糧食總產量比計劃少收 30 萬噸。政府反而提高了農業實物稅的上繳比例，從 27%（大米）和 23%（其他農作物），統一增加到 50%。為完成收購計劃，各級幹部逼迫農民交糧，採取了包括逮捕在內的鎮壓手段，以至在糧食採購期間出現了農民自殺事件和暴動的危險。<sup>31</sup>

在國家關係方面，據蘇聯外交部的觀察，在對敵鬥爭和經濟建設中，“朝鮮同志顯然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民主陣營的力量”，沒有充分肯定蘇聯、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援助。<sup>32</sup> 外交部的另一份報告特別談到，中朝關係有“不正常現象”。如“志願軍司令部坐落在離平壤幾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條件很差，朝鮮領導同志也極少去那裡”；在平壤的戰爭展覽館，12 個戰績展廳中只留給中國志願軍戰士一個，而在其餘的所有展廳中，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行動被解釋成與中國志願軍無關；“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國呆過的領導工作者在黨和政府中的職務”等。庫爾久科夫注意到，中國政府在 1952 年召回駐朝大使後，直到 1955 年 1 月沒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鮮駐華使館舉行的招待會上，周恩來“幾乎沒有同朝鮮代表交談

---

<sup>31</sup> 上述資料來自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7 日，波諾馬廖夫和謝爾巴科夫致蘇共中央函，1955 年 5 月 17 日，庫爾久科夫對蘇聯駐朝使館 1955 年政治報告的簡介，1956 年 3 月 31 日，ЦХСД, ф.5, оп.28, д.314, л.33~63, 212~214, 271~279。

<sup>32</sup> 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6 日，ЦХСД, ф.5, оп.28, д.314, л.12~15。

過”。他的結論是，“中國同志對朝鮮人的行為很不滿（儘管沒有公開表達過），但他們對朝鮮人表現得很克制”。<sup>33</sup> 俄國檔案記載的這個情況，大體不錯。<sup>34</sup> 不過，蘇聯使館的情報說金日成當時就有意逐步解除延安派幹部的職務，未免言過其實。從此前幾年朝鮮數次黨內鬥爭的規模和結果看，金日成當時要對付的，不僅是延安派，甚至主要不是延安派。

朝鮮勞動黨是在戰前不久才由四個主要派別聯合組成的，以金日成為首的游擊隊派雖然人數不多，但佔據了主導地位；延安派成員則多為軍事領導幹部，在戰爭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莫斯科派（來自蘇聯的朝鮮族人）和南方派（或國內派）雖勢力較小，但也有個別領袖人物在黨內很有影響。還在戰爭期間，那些對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構成威脅的各派領導幹部就開始遭到清洗。矛頭首先指向掌握著軍事實權的延安派幹部。1950年12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罷免，不久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繼被貶和被捕。隨後輪到莫斯科派幹部。1951年11月，莫斯科派中最突出的人物許哥而（Ho Ka-yi）因與金日成意見不合，被開除黨籍，雖在蘇聯的干預下保留了副首相的職務，但最終還是被置於受審的地步，被迫於1953年初自殺。1953年8月，以李承燁（Lee Sung-yob）為首的一大批南方派幹部受到法庭審判，罪名是美國間諜、破壞南方革命力量和企圖顛覆共和國。此案的矛頭實際上是針對早在半年前就被捕的南方派首腦人物朴憲永的，兩年後，最高法院以間諜罪判處朴憲永死刑。經過一連串的內部爭鬥，朝鮮黨內各派終於都歸附金日成麾下，朝鮮停戰後不久形成的新領導班子，不僅

---

<sup>33</sup> 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5年4月7日，ЦХСД, ф.5, оп.28, д.314, л.33~63；另參見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月27~29日，ЦХСД, ф.5, оп.28, д.412, л.126~127。

<sup>34</sup> 例如，經查，中國大使倪志亮1952年3月離任，直到1955年1月中國政府才任命潘自力為新大使。關於戰爭紀念館的說法也是真實的，筆者2006年到平壤參觀時專門去看過，情況依然如此。

增加了游擊隊派的金一，還有延安派的金科奉、金昌滿（Kim Chang-man），莫斯科派的朴昌玉（Pak Chang-ok）、朴永彬（Pak En-bin），甚至南方派的朴正愛。<sup>35</sup> 然而，分歧和矛盾只是在高壓下暫時消失，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

有學者指出，1955年12月金日成首次提出的“主體思想”（Juche）是“源於對抗蘇聯和親近中國的思考”，其主要目的是“消除蘇聯的影響”，隨後開展的對朴昌玉、朴永彬等一批來自蘇聯的朝鮮族幹部的批判，證明了這一點。相反，為了加強黨員的黨性修養，金日成曾指出應“學習中國的整風運動”。<sup>36</sup> 鑒於當時提出新方針並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產生影響的主要是莫斯科，關於主體思想是源於對抗蘇聯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說這裡有“親近中國”的考量，恐怕不夠準確。實際上從金日成的一貫做法來看，時而倒向莫斯科，時而親近北京，這只是他在兩個大國的夾縫中求得生存和保障利益的手段，但無論哪一邊有可能威脅到他的地位，他都不會忍受的。1956年八月事件及其前後發生的事情，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蘇共二十大以後，在赫魯曉夫（Khrushchev）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風潮的影響下，朝鮮黨內的不滿情緒再次爆發出來。1956年3月19日金日成收到蘇聯使館送來的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

---

<sup>35</sup> 上述資料詳見康仁德編：《北韓全書》上卷，第260~261頁；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第107~122頁；北韓年鑒刊行委員會編：《北韓總鑒（1945~1968）》，（韓國）共產圈問題研究所1968年，第175~176頁；金南植、沈之淵編著：《朴憲永路線批判》第五章，（韓國）圖書世界出版社1986年。筆者請余偉民等人翻譯了這些韓文資料，並在此表示感謝；俄國檔案也證實了一些這方面的情況。見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5年4月7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33~63。

<sup>36</sup> 根據1956年1月18日朝鮮勞動黨《關於進一步加強與文學藝術領域的反動意識形態作鬥爭》的決議，朴昌玉被開除出中央常務委員會，朴永彬撤銷中央常委和中央委員職務（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第125~126頁）；蘇聯外交部情報委員會關於朝鮮內部個人崇拜情況的報告，1956年4月5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57~67。

果〉的報告後，表示將認真貫徹到朝鮮黨實際工作中。<sup>37</sup> 但蘇聯大使伊萬諾夫（Ivanov）瞭解的真實情況是，在第二天中央全會學習蘇共二十大的材料時，除了從莫斯科回來的崔庸健做報告外，只有金日成、外相南日和宣傳部副部長李一根（Li Il'-gen）三人發言。談到個人崇拜問題時，金日成專講南方黨員對朴憲永的崇拜，而對朝鮮勞動黨內嚴重存在的對他個人的崇拜現象，如全國各地都建立了他的紀念碑，到處可以看到他的肖像、電影、歌曲、著作都在歌頌他的英明等，卻隻字不提，只是要求以後在報紙宣傳中不要再突出個人作用了。會上宣讀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翻譯文本，但沒有進行討論，也沒有做任何決議。<sup>38</sup> 會後，勞動黨中央向各機關下發了關於學習蘇共二十大的秘密文件，其中的基調是朝鮮勞動黨在各方面都“始終堅持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並多次強調集體領導是黨的最高原則，“勞動黨中央從未放棄這一原則”。至於黨內的個人崇拜問題，只是以前曾經有過，且只與朴憲永有關。<sup>39</sup>

1956年4月23~28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的主要目的是進行人事調整，進一步消除反對派的勢力和影響。會議既沒有討論人們議論紛紛的黨內個人崇拜問題，也沒有消除前一段廣大幹部對人事處理的不滿情緒，甚至都沒有研究人民普遍關心的經濟困難和生活問題。金日成的長篇報告，除了讚揚朝鮮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成就外，就是反復批判朴憲永等南方派領導人以及其他“分裂黨的宗派主義活動”。至於蘇共二十大路線和集體領導問題，報告中既沒有讚揚，也沒有反對。很多人要求在大會發言，都被拒絕——因為知道他們要說什麼。大會對中央委員會進行了大規模調整，以保證對

---

<sup>37</sup>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3月19日，ЦХСД，ф.5，оп.28，д.411，л.164~165。

<sup>38</sup>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3月21日，ЦХСД，ф.5，оп.28，д.411，л.165~168。

<sup>39</sup> 伊萬諾夫致費德林函，1956年4月18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137~139。



金日成的忠誠和支持。在 71 名中央委員中，新選 43 人，上屆保留下來的只有 28 人，在 45 名候補中央委員中，新選 43 人，保留的只有二人。<sup>40</sup> 以致於會議期間，在報紙和發言中對金日成的頌揚反而愈演愈烈，令蘇聯外交部感到“很不正常”。<sup>41</sup> 在貫徹代表大會精神的平壤市委積極分子會議上，積極追隨金日成的勞動黨副委員長金昌滿的表現很說明問題。金昌滿在高度評價了代表大會的意義後指出：“我們黨內沒有個人崇拜現象”，過去出現過的，就是“在南方對朴憲永的個人崇拜，在北方對許哥而的個人崇拜”。同時警告大家，“關於現在我們黨存在個人崇拜的言論不僅不能鞏固、反而只會削弱我們黨。因此，誰要發表這樣的言論就處分誰”。<sup>42</sup>

這次會議的人事調整主要是針對莫斯科派的，在代表大會之前一次審議候選人的中央會議上，金日成提出，有一些從蘇聯回來的幹部已經接受了朝鮮國籍，又不願放棄蘇聯國籍，為什麼還要選他們當中央委員？對此，崔庸健憤怒地說道，既然他們腳踏兩隻船，就應該把他們踢出去。結果，這些人全部被排除在候選人之外。在代表大會後召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上，金日成又針對莫斯科派幹部經常光顧蘇聯使館的情況，特別強調了保守機密和加強紀律的問題，並規定從即刻開始，與外國人的一切聯繫必須通過外交部和外貿部進行。這一時期，鬥爭的矛頭主要是指向莫斯科派的，因此對延安派顯得十分寬容。也是在這次常委會議上，金日成突然主動提出了朴一禹的問題，他通報了有關朴一禹案件的調查情況後指出，調查結果尚不能確定其

---

<sup>40</sup> 伊萬諾夫關於朝鮮局勢的報告，1956年12月28日，ЦХСД，ф.5，оп.28，д.486，л.1~17；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第128~130頁；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5月5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20~222；伊萬諾夫與金承化會談紀要，1956年5月24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07~211。

<sup>41</sup> 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6年4月29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163~170。

<sup>42</sup> 費拉托夫與朴澤燮會談紀要，1956年5月25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02~203。

所犯罪行的具體內容。於是，金科奉和金光俠均表示應立即釋放朴一禹，但崔庸健仍堅持應當槍斃，南日也認為朴必須受到懲罰。最後，金日成決定：朴一禹理應予以釋放，但目前暫不執行。<sup>43</sup> 對於延安派幹部李相朝的問題，金日成也沒有追究。李在戰爭初期曾作為金日成的代表住在北京，這次是從駐蘇大使任上特意回國參加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會議期間，他曾兩次給主席團寫便條，建議討論勞動黨內部存在的個人崇拜問題。李提的建議非但沒人理睬，還被金昌滿叫去責罵了一頓。崔庸健、朴金喆（Pak Kym-cher）等人甚至主張撤銷其大使的職務。後來金科奉出面找金日成，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見，事情才算過去。<sup>44</sup>

金日成對延安派採取如此寬容的態度，顯然是因為他知道在排擠莫斯科派的問題上，與蘇聯的矛盾是無法迴避的。還在二十大前，蘇聯外交部就反映了朝鮮黨內對金日成個人崇拜的種種表現，並建議蘇共中央提請金日成注意改正。<sup>45</sup> 而現在，蘇聯外交部所屬情報委員會還特別注意到，不久前對莫斯科派領導幹部的嚴厲處罰，與這些人多次提醒金日成注意個人崇拜問題有關。因此，委員會建議蘇共中央對朝鮮黨進行幫助。<sup>46</sup> 外交部遠東司則認為，對朴昌玉等人的批判，“實際上是發起了一場旨在反對所有蘇聯朝鮮族人的運動”。<sup>47</sup> 1955年底，在朝鮮共有來自蘇聯的朝鮮族幹部 136 人，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 1955 年 12 月 31 日法令，他們必須確認一個國籍。在回答徵詢問

---

<sup>43</sup> 伊萬諾夫日記，1956 年 5 月 10 日、18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27~229，д.410，л.174~177。

<sup>44</sup> 薩姆索諾夫與金善福會談紀要，1956 年 5 月 31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222~223。

<sup>45</sup> 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7 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33~63。

<sup>46</sup> 蘇聯外交部情報委員會關於朝鮮內部個人崇拜情況的報告，1956 年 4 月 5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57~67。

<sup>47</sup> 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6 年 4 月 29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163~170。

卷時，當時多數人表示願意加入朝鮮國籍，只有 24 人提出在加入朝鮮國籍後，還想保留蘇聯國籍。在朴昌玉、朴永彬等人被解職後，面對朝鮮黨對莫斯科派幹部的排擠和歧視，很多人感到後悔，有人（如建設相、人民軍衛生部部長等）甚至偷偷到蘇聯使館要求保留或恢復蘇聯國籍。<sup>48</sup>

李相朝回到莫斯科，立即於 1956 年 5 月 30 日約見了蘇聯副外長費德林（Fedorenko）。在通報了金日成將訪問蘇聯和東歐各國以求經濟援助的情況後，李相朝詳細報告了朝鮮黨內的不正常情況，並強調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實際上籠罩著整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缺乏集體領導，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個人決定。對金日成的吹捧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朝鮮人民革命博物館變成了金日成個人事業的歷史博物館”，甚至傳說“金日成在兒童時代就已經開始領導朝鮮人民進行反抗日本的解放鬥爭了”。李相朝還指出了金日成在經濟工作和使用幹部方面及戰爭期間的種種錯誤，並多次強調，蘇共中央必須儘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幫助朝鮮黨，特別是幫助金日成克服他那些危險的錯誤。<sup>49</sup> 在不久後的另一次會談中，李相朝還建議，蘇聯領導人與金日成會談時，最好要求朝鮮代表團的成員都參加，這樣效果會好一些。否則，朝鮮黨內不會聽到蘇聯的意見。<sup>50</sup> 6 月 8 日，副首相崔昌益也秘密地單獨約見了蘇聯大使。崔全面報告了朝鮮最近的情況，特

---

<sup>48</sup> 庫爾久科夫對蘇聯使館 1955 年政治報告的簡介，1956 年 3 月 31 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271~279；伊萬諾夫日記，1956 年 5 月 7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22~224。朴昌玉、朴永彬等很多人都曾到蘇聯使館訴說冤情和反映情況。伊萬諾夫日記，1956 年 4 月 13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120~121。蘇聯外交部情報委員會關於朝鮮內部個人崇拜情況的報告，1956 年 4 月 5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57~67；伊萬諾夫日記，1956 年 5 月 5 日、10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20~222、225。

<sup>49</sup> 費德林與李相朝會談紀要，1956 年 5 月 30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190~196。

<sup>50</sup> 庫爾久科夫與李相朝會談紀要，1956 年 6 月 16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38~241。

別是在幹部使用問題上的錯誤傾向：黨內領導幹部的任用既沒有照顧到來自國內、中國和蘇聯等各個方面的幹部，更不是任人唯賢，提拔的都是那些沒有文化、沒有經驗卻專門會溜鬚拍馬、阿諛奉承的人，這也是造成嚴重個人崇拜現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樣強烈要求蘇共中央幫助改變這種狀況，並希望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議。崔說，對於蘇聯的建議，金日成一般都會認真對待的。<sup>51</sup>

關於金日成訪蘇期間與蘇聯領導人談話的情況，目前沒有詳細資料。只知道金曾受到赫魯曉夫的接見，會談中蘇聯領導人對他提出了一些意見，但因有些情況不明，委託中央聯絡部弄清楚。金日成則表示接受批評，以後注意改正錯誤。事後，莫斯科向中共中央通報了談話結果，毛澤東認為蘇共這樣做很好。<sup>52</sup> 1956年8月2日，蘇共中央又通過使館向勞動黨傳達了進一步的看法，即希望金日成在批評朝鮮黨的一些錯誤做法時應表現得主動一些。<sup>53</sup> 對於金日成排除異己的做法，北京和莫斯科本來是表示過不同意見的。<sup>54</sup> 蘇共二十大前後朝鮮黨打擊莫斯科派幹部和繼續大搞個人崇拜的做法，引起蘇聯領導人的不滿，也是可以想見的。所以，朝鮮黨內的反對派寄希望於從外部對金日成施加壓力，莫斯科的表態在很大程度上對他們在8月全會發起反對金日成的進攻起到了刺激和鼓勵的作用。

---

<sup>51</sup>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6月8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210~214。

<sup>52</sup> 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記錄，1956年9月18日。

<sup>53</sup>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8月6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335~337。

<sup>54</sup> 例如，武亭被撤職後回到了中國，由此躲過審判（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第107~109頁）。據蘇聯方面的情報，朴一禹被排擠引起了中國軍方的不滿（波諾馬廖夫和謝爾巴科夫致蘇共中央函，1955年5月17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212~214）。1953年11月金日成到北京時，毛澤東提醒他無論如何不能殺朴憲永，蘇聯也通過顧問向金日成建議不要殺人，但金不予理睬。後來蘇聯大使問起此事，金十分不滿，甚至與其發生了爭執（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記錄，1956年9月18日；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4月19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14~216）。

據俄國檔案反映的情況，在勞動黨三大期間及以後，金科奉、崔昌益、朴昌玉、朴義琬、徐輝、尹公欽、金承化（Kim Cyn-khva）等一批領導幹部對朝鮮黨內的個人崇拜狀況、幹部政策和經濟方針感到不滿，特別是金日成出訪期間在波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更加強了這種對立情緒。他們希望在 1956 年 8 月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揭露和批評這些錯誤。8 月初金日成回國會後瞭解到這種情況，立即採取了應對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朴正愛等人頻繁與蘇聯使館接觸，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評，同時指責這些反對派人物對抗黨的方針並煽動不滿情緒是“反黨”行為，以無能、獻媚和歷史問題為由堅決要求撤換金日成身邊的一批領導幹部是“宗派”和“分裂”活動，他們已經形成了“反黨集團”，其結果將破壞黨的威信和地位，造成危險局面。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分別地、反復地找一些有不滿情緒的幹部談話，採取威脅、利誘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對派隊伍。如說服金科奉放棄了撤換幹部的主張，迫使朴義琬採取了中立立場，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學習等。此外，還使用警察手段監視反對派幹部，對他們的司機、保姆進行審問，並急召出訪的內務相方學世（Pan Khak-se）回國佈置防範措施等等。經過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動權。蘇聯使館的態度令他滿意：除了按照莫斯科的要求希望金日成對朝鮮黨的錯誤採取主動姿態，並不得打擊報復提意見的幹部外，伊萬諾夫明確表示，召開中央全會的目的是鞏固勞動黨的領導地位，維護黨內團結，為此同意金日成先召開中央常委會議統一思想。這實際上就表明，蘇聯不同意反對派關於撤換一批領導幹部的核心主張。蘇聯還表明了不干預朝鮮黨內部事務的基本立場，這更讓金日成感到放心。於是，在 8 月 21~23 日召開的常委會議上，雖有一些不同意見發表，但最後的結論是：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犯錯誤的主要是許哥而和朴昌玉等人，對此“中央常務委員會將採取措施來予以清除”；

根據目前調查的材料，沒有理由對黨的領導幹部進行撤換。金科奉謹慎和退縮的發言，是金日成能夠把握這次會議方向的關鍵因素。8月28日常委會通過了金日成將在中央全會上做的報告草案。報告包括代表團出訪的結果、朝鮮國內的形勢和勞動黨的狀況及任務三個內容，基調同以前一樣。報告沒有涉及黨內生活問題，只說可以在全會討論，但在結尾處，金日成提出黨內“存在著派別和宗派活動殘餘”，號召全黨加強警惕並與之鬥爭。<sup>55</sup>

1956年8月30~31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了中央全會。金日成按照預定程序首先做了常委會一致通過的報告，隨後的兩個發言均是表示同意的讚美之詞。第三個發言的是延安派幹部、貿易相尹公欽，他以“憤怒的揭發式語調”批評黨內存在的錯誤傾向。尹的發言被多次打斷，並淹沒在一片反對聲中，崔庸健甚至站起來大罵，會場一度陷入混亂。崔昌益起身想發言，為尹公欽辯護，但沒有得到講話機會。面對如此局面，中午休會的時候，尹公欽與工會主席徐輝、文化部副相金剛（Kim Gan）、建材局長李弼奎（Li Pkhir-giu）悄悄離開會場，潛往中國。在以後的會議中，除崔昌益、朴昌玉表示贊同尹公欽的意見，幾乎所有的發言都指責這種“反革命和反黨”言論，並對上述幾人的“錯誤”或“罪行”展開了猛烈抨擊，崔昌益被說成是反黨集團的首領和思想家。第二天的會議做出決議：由於“從事反黨活動”，開除尹公欽、徐輝、李弼奎和金剛四人的黨籍，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職務，解除朴昌玉內閣副首相和中央委員的職務，上述問題均移交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審查。不久，朴昌玉被迫到東海岸一個小型鋸木廠去當廠長，而崔昌益則被任命去負責一個養豬場的工作。會後，“整個國家陷入大規模的搜捕和強力鎮壓之中”，很多黨內重大問題遭到歪曲，

---

<sup>55</sup> 史料來自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8月6~29日、9月1日，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335~359、317~321。

呈現在全體黨員群眾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對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滿的人策劃了宮庭政變式的嚴重密謀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蘇聯使館，崔庸健到中國使館，分別通報了全會情況和所做決議。<sup>56</sup>

1956年9月3日，朝鮮政府正式向中國外交部通報，有四名朝鮮公民在安東地區越過朝鮮邊境並被中國邊防軍截獲，請求中國政府將上述人等遣返回國。喬曉光大使代表中國政府當場答復：這些人並非普通越境者，強制性將其遣返是不可能的。喬將這一情況向伊萬諾夫做了通報，並詢問蘇聯的看法。<sup>57</sup>顯然，中國政府此前已經確定了自己的立場，而莫斯科的態度就比較謹慎了。

1956年9月5日，朝鮮駐蘇大使李相朝求見費德林並提交了他給赫魯曉夫的信。李指責金日成對提意見的同志實行鎮壓，請求蘇共中央干預此事。還說，外務省已經兩次召他回國，他聲稱有病，還未成行。<sup>58</sup>9月6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討論朝鮮問題。會議決定，委託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波諾馬廖夫（Ponomarev）經過“周全的考慮”後接見李相朝，並答復中國大使，蘇共中央將委託正在出席中共八大的蘇共代表團與中共中央交換意見。<sup>59</sup>在9月10日與李相朝會談時，波諾馬廖夫答復：蘇共對朝鮮發生的事情表示憂慮，蘇共代表團將與同樣在中國的勞動黨代表團和中共商談此事，但不會干

---

<sup>56</sup> 史料來自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9月1、4、6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319~321、322~325、327~332；謝斯捷利科夫日記，1956年9月14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302~303。

<sup>57</sup>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9月4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322~325。

<sup>58</sup> 費德林與李相朝會談紀要，1956年9月5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224~228；在蘇聯養病的郵電相也不敢回國，因為一旦回去就會被捕（見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記錄，1956年9月18日）。

<sup>59</sup>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5，л.30，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速記記錄草稿，1954~1964，第一卷），с. 166~167。

預朝鮮黨的內部事務。對於李請求蘇共公開發表批評朝鮮黨的言論的建議，波諾馬廖夫拒絕討論。<sup>60</sup> 其實，莫斯科的這種立場並不是在事件發生後才突然形成的。由於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在蘇聯國內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引起的震動和混亂，加上中共中央4月5日文章的公開發態，使得蘇共在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上的態度變得謹慎起來，甚至對那些比較激烈的批判言論採取了壓制的做法，蘇共中央6月20日決議充分表明了這一點。<sup>61</sup> 在後來與金日成的會談和通信中，蘇聯領導人透露了這些情況，並表現出對繼續批判個人崇拜的謹慎態度。金日成立即在朝鮮黨內傳達了這些信息。<sup>62</sup> 應該說，蘇聯態度的轉變，無疑是金日成敢於採取嚴厲措施處理黨內問題的因素之一。

為了平息黨內的不滿情緒，同時也爭取莫斯科的同情，金日成在中央全會後，立即對在此前受到打壓的莫斯科派幹部採取了懷柔政策。1956年9月14日下午，朴正愛召集從蘇聯返回的朝鮮幹部開會，出席者約一百人（佔全部莫斯科派幹部的三分之二）。會議的目的就是宣佈中央將改變對來自蘇聯的朝鮮幹部的態度，並為他們平反。<sup>63</sup> 個中的道理很簡單，因為這次鬥爭的主要矛頭已經轉向延安派了。從金日成等人向蘇聯報告的情況看，與8月“反黨”事件有牽連的，主要是延安派幹部，不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動主謀的崔昌益和徐輝，就連反對派中的最高層幹部、黨內元老“老頭子”金科奉，

---

<sup>60</sup> 波諾馬廖夫關於李相朝會談情況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9月12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228~232。

<sup>61</sup> 詳見沈志華：〈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李丹慧主編：《國際冷戰史研究》第1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8~70頁；蘇共中央決議見：РГНИ，ф.3，оп.14，д.39，л1、30~34，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352~368，中譯文見：《人民日報》1956年7月6日。

<sup>62</sup> 波諾馬廖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9月12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228~232。

<sup>63</sup> 謝斯捷利科夫日記，1956年9月14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302~303。



都是陸續從中國回來的。據說，金日成曾講過這樣的話：參與政變陰謀的人都屬於延安派。<sup>64</sup> 因此，金日成才會改變對莫斯科派的態度，目的是集中對付來自北京的壓力。

1956年9月18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人與蘇共代表團商談了處理朝鮮問題的意見。米高揚說，昨天他與朝鮮代表團談話，批評了他們，但崔庸健不服氣。還說，蘇共對情況不太瞭解，還沒有肯定的意見，建議中蘇兩黨共同派人去平壤，瞭解情況。毛澤東在談話中則對朝鮮許多同志無辜被捕、開除、撤職的做法極為不滿，並直接指出，金日成還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對的話都聽不得，誰反對，就殺誰。與米高揚“瞭解情況”的建議不同，毛澤東提出，中蘇兩黨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勸他們團結”，“收回成命”，恢復反對派的黨籍和職務。毛澤東說：“我們要對金日成說，我們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幫助你，但是你必須改正錯誤”，“我們也要勸那些被整的人採取和解態度，勸雙方和解”。具體方法是召開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全會，中蘇代表參加；會議要做出決議，還要公開發表。毛澤東還對米高揚說，金日成對我們有情緒，不聽中國的，這次主要靠你們了。米高揚沒有明確表示意見，只說去談談看。中共希望這次去就要解決問題，但米高揚推說國內還有事情，不能過多停留。<sup>65</sup> 接著，中共領導人又與朝鮮代表團舉行了會談。毛澤東一開始就指出，朝鮮在經濟政策和幹部政策方面的“問題很嚴重”，並通知他們，中蘇兩黨決定派代表團明天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幫助你們解決問題而不是要破壞你們”。毛還說，對於朝鮮黨的做法，過去就有意見，例如朝鮮戰爭，開始就提醒過金日成不應該打，後來又警告他敵人可能從後方登陸。彭德懷和李克農甚至質

---

<sup>64</sup> 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第131~133頁。

<sup>65</sup> 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記錄，1956年9月18日。

問：朝鮮戰爭到底是誰發動的？是美帝國主義發動的還是你們發動的？會談中對朝鮮人的批評非常嚴厲，指責他們在幹部問題上敵我不分，犯了“路線錯誤”，“黨內充滿恐怖情緒”。毛最後說，我們可以叫跑到中國來的同志回去，但回去一定要恢復他們的黨籍和職務，把問題拿到黨的會議上冷靜地加以解決。<sup>66</sup>顯然，中共的態度更加明確，不過，除了要求金日成糾正錯誤外，並沒有進一步的企圖。

米高揚和彭德懷等人到達平壤後，首先找金日成單獨談話，經過兩次深談，金日成原則上接受了中蘇兩黨的意見。1956年9月22日召開的中央全會做出決議，承認八月會議處理問題的方法“過於簡單”，同意恢復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職務，恢復出逃中國者的黨籍。米高揚回到中國後表示任務已經完成，但毛澤東指出：“問題並沒有結束，而是剛剛開始”。的確，正如蘇聯大使所說，實際上金日成是被迫否定8月決議的，而9月全會通過的決議，也是“兄弟黨對朝鮮勞動黨領導人施加影響的結果”。因此，在中蘇代表團離開平壤以後，金日成不僅沒有執行與米高揚、彭德懷達成的協議——在媒體公佈9月全會決議（只在黨內傳達並在報紙上發了一個簡短消息），反而繼續對有不同意見的幹部進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國。此外，關於釋放朴一禹的協議遲遲沒有結果，答應恢復尹公欽等人家屬糧食供應的諾言也一直沒有履行。儘管中國一再表示對於是否執行這些協議的結果非常關心，但朝鮮方面一直虛與委蛇，拖延不辦。<sup>67</sup>後來，波蘭和匈牙利爆發危機，莫斯科和北京都去關注歐洲的問題，朝鮮的事情便暫時平息下來。

---

<sup>66</sup> 毛澤東接見朝鮮代表團談話紀要，1956年9月18日。

<sup>67</sup> 詳見毛澤東與米高揚談話記錄，1956年9月23日；伊萬諾夫關於朝鮮局勢的報告，1956年12月28日，ЦХСД，ф.5，оп.28，д.486，л.1~17；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0月1、8、26日，11月22日，ЦХСД，ф.5，оп.28，д.486，л.26、28~33；ЦХСД，ф.5，оп.28，д.412，л.344~347；ЦХСД，ф.5，оп.28，д.411，л.295~296。

## 九、志願軍全部撤離朝鮮與中朝關係的改善

在中朝關係日益緊張的情況下，金日成進一步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攏的步伐。借著蘇聯出兵匈牙利的舉動，1956年11月2日南日向蘇聯大使表示，朝鮮“今後必須採取一系列措施鞏固同蘇聯的友誼”，“我們認為現在所有的進步力量都應當更加緊密地團結在蘇聯周圍”。<sup>68</sup> 在朝鮮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對他說：“除了鞏固與蘇聯的聯繫和友誼，朝鮮沒有也不會有其他的政治路線”。<sup>69</sup> 此外，為了取悅莫斯科，朝鮮外務省還不斷向蘇聯使館散佈一些有關中國的消息，挑撥中蘇關係。如中國副外長單獨約見朝鮮、越南和蒙古大使，通報匈牙利事件；中國人說，蘇聯承認在對波蘭問題的看法上犯了錯誤；李相朝有親華情緒而輕視蘇聯等等。<sup>70</sup> 對於這些情況，北京未必一無所知，但卻沒有做出進一步反應。因為，這時中國的看問題的角度也出現了很大變化。

波匈事件發生以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及蘇共二十大路線的看法逐步發生了轉變，認為蘇聯放棄階級鬥爭、與美國實現緩和的方針是錯誤的，並由此表露出對蘇共繼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能力和地位產生了懷疑，特別是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後，中蘇之間的分歧逐漸擴大。<sup>71</sup>

為了加強自身的力量和影響，中共不得不對朝鮮採取容忍和友好

---

<sup>68</sup>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1月2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364~365。

<sup>69</sup>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1月28日，ЦХСД，ф.5，оп.28，д.411，л.297~300。

<sup>70</sup>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1月9、28日，ЦХСД，ф.5，оп.28，д.411，л.292~294、297~300。

<sup>71</sup> 詳見沈志華：〈中國對東歐十月危機的反應和思考〉，《史學月刊》2007年第1期，第75~89頁；〈毛澤東、赫魯曉夫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2~109頁。

的方針。這首先反映在中國對流亡的延安派幹部的態度上，中國地方檔案中有這樣一些材料：1957年3月4日，移居長春的朝鮮勞動黨平壤市委前組織部長金忠植（Kim Chyn-sik）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寫信，要求向蘇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遞交有關他個人和勞動黨的材料，並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sup>72</sup> 若是在幾個月前，這些材料確是中共急需的，但現在已經沒有人關心了。3月16日，吉林省委書記富振聲在與金忠植談話時不客氣地說：“你從朝鮮來我國，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們曾經要求你回國，但是你堅決不願意回去，我們只好把你留下來。”然後嚴肅地告訴他：中朝兩黨和兩國關係一向友好，中國也“不願干涉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內部事務”。最後，富根據中共中央的委託轉告他，在中國期間，要儘量避免與朝鮮人及中國朝鮮族人接觸和通信，更不能談論朝鮮的問題。<sup>73</sup> 6月28日，在吉林避難的前朝鮮駐蘇大使館工作人員金俊根（Li Diun-gen）、李熙相（Li Khi-Sang）寫信給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國參加一定的組織生活。7月9日中共中央聯絡部答復吉林省委：“告訴他們，我們沒有這樣合適的組織給他們參加。至於幫助他們自學的問題，請你們就近指定一適當的同志，幫助他們自學”。<sup>74</sup>

的確，此時的中朝關係有了迅速好轉的勢頭。八月事件前後，中國政府對於朝鮮提出的在1957年給予額外無償援助或五千萬元貸款的請求一直沒有回應，最後乾脆予以拒絕。因此，朝鮮也取消了預定的以副首相金一為首的經濟代表團訪華的安排。<sup>75</sup> 而現在情況完全不一樣了。為了迎接1957年9月中旬金一率朝鮮勞動黨中央經濟代

---

<sup>72</sup> 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41，第174張。

<sup>73</sup> 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41，第169張。

<sup>74</sup> 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41，第183~184張。

<sup>75</sup> 伊萬諾夫關於朝鮮局勢的報告，1956年12月28日，ЦХСД，ф.5，оп.28，д.486，л.1~17。

表團訪華，與中方商討朝鮮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標和援助問題，中國政府做了非常周密的準備和安排。<sup>76</sup> 10月25日志願軍入朝作戰七週年時，中朝關係的昇溫最為明顯。金日成不僅致函志願軍司令員楊勇上將表示感謝，還專門給毛澤東發出賀電，毛澤東也親自回電致謝。朝鮮政府還在平壤召開紀念集會，並組織群眾開展慰問、立像和掃墓活動。幾天後的十月革命紀念日，據《人民日報》報導，“志願軍駐地一片節日景象”。<sup>77</sup>

在這樣的氣氛中，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與金日成舉行了會談。金日成在會談中強調了朝鮮在法律上的獨立地位，並向毛澤東詳細講述了八月事件“陰謀顛覆”朝鮮政權的性質，取得了毛的認可。回國後，金日成立即採取行動，進一步在黨內進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擊的金科奉這次也沒有逃脫噩運，先是被開除黨籍，而後遭到拘禁，最後被送往順安農場進行勞動改造。隨後被肅清的，不僅有延安派幹部，還有對金日成不滿的其他派系的領導幹部金元鳳（Kin Von-bon）、趙素昂（Cho Co-an）等。<sup>78</sup> 中國使館獲得的一份勞動黨內部講話材料稱：到1958年初，朝鮮“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國家反黨的宗派分子”，進一步肅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欽、金承化、徐輝、李弼奎等反黨宗派分子的殘餘毒素”。講話在談到國際形勢時，特別提到了“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還頌揚中國“以強大的力量登上國際舞臺，在解決國際問題方面

---

<sup>76</sup> 關於朝鮮勞動黨中央經濟代表團訪華活動的文件，1957年8月24日至9月19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7-00665-03，第5~24頁。

<sup>77</sup> 《人民日報》1957年10月25、26、30日，11月9日。

<sup>78</sup>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I,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速記記錄草稿, 1954~1964, 第一卷), с. 960~961; 北韓年鑒刊行委員會編:《北韓總鑒》, 第178~179頁; 康仁德編:《北韓全書》上卷, 第262~263頁。

起著鉅大的作用”。<sup>79</sup> 這一切自然是中朝關係改善的結果。此時，中共對勞動黨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變。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稱讚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簽了字，是反帝國主義的，是堅持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還說，1956年中國和蘇聯派人去朝鮮解決人家的內部問題，用意是好的，但結果不好，方式不對。周恩來在1958年2月訪朝回國後也說，從朝鮮跑過來的那些人反映的情況很片面，導致中國對朝鮮產生了錯誤看法。<sup>80</sup> 《人民日報》還摘要刊登了朴金喆在勞動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其中有一大段是專門點名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反黨宗派”的。<sup>81</sup>

為了安撫金日成，進一步鞏固中朝關係，毛澤東又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即撤回在朝鮮的全部志願軍部隊。就社會主義陣營一方來說，停戰後的朝鮮問題主要由中國出面解決。中朝關係緊張以後，雙方對解決朝鮮問題的方式和途徑產生了分歧，平壤有意擺脫北京對這一問題的控制。1956年11月，朝鮮政府向中國政府發出備忘錄，提出讓聯合國出面協助解決朝鮮問題。中國對此表示反對，認為這個建議違反了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蘇、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則。在徵求了莫斯科的意見後，中國政府在12月8日的回電中指出，聯合國事實上和法律上都是參戰的一方，而且聯合國只承認南朝鮮政府，故沒有資格出面協調；目前“全面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的條件還不成熟”，為此“需要經歷長期的鬥爭”。同時，中國政府還遇到了一個更棘手的問題。針對志願軍幹部違反朝鮮的法律和風俗、傲慢地對待朝鮮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鮮內政的個別事件，有朝鮮公民甚至領導人把志願軍看

---

<sup>79</sup> 朝鮮領導人的內部講話，1958年1月，中國外交部檔案館，204-00612-01，第28~39頁。

<sup>80</sup> 周恩來與遼寧省幹部的談話記錄，1958年2月21日，吉林省檔案館，1-14/1-1958.94，第106~108張。

<sup>81</sup> 《人民日報》1958年3月9日，第3版。

成是佔領軍，認為他們侵犯了朝鮮主權，因而繼續在朝鮮駐守是不受歡迎的。<sup>82</sup> 正是因為瞭解到這種情況，毛澤東在 1956 年 9 月與米高揚會談時就提到，金日成有可能要求中國撤軍，儘管蘇聯人對此表示懷疑。<sup>83</sup>

朝鮮停戰以後，中國軍隊便陸續部分地撤退回國。1954 年 9 月撤回七個師，1955 年 3 月撤回六個師，到 1956 年 4 月在朝鮮的志願軍部隊還有 44 萬人。<sup>84</sup> 在中國和蘇聯看來，志願軍是社會主義國家對抗美國在南朝鮮駐軍的主要力量。雖然 1956 年 4 月中國政府發出呼籲，要求各方同時從朝鮮撤軍，但是正如中國在向蘇聯通報時自己認為的，這個建議只不過是為了減輕來自中立國方面的壓力，是對美國企圖取消中立國委員會主張的回應，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在 1957 年 1 月周恩來訪蘇前夕，考慮到中國的立場，蘇聯外交部確定的討論朝鮮問題的既定方針是，蘇聯政府認為應該強調，在目前局勢下，中國人民志願軍繼續駐紮的朝鮮，“不論是從朝鮮人民利益還是從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利益的觀點看都是必要的”。<sup>85</sup> 然而，到 1957 年 11 月，毛澤東的主張就完全改變了。

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兩次與金日成談話，主動提出中國軍隊全部撤離朝鮮，並指出現在形勢大好，“東風壓倒西風”，美

---

<sup>82</sup> 蘇聯駐中國大使館 1956 年度報告，1957 年 4 月 18 日，АВІРФ, ф.5, оп.28, п.103, д.409, л.139~143；停戰以來志願軍與朝鮮黨政軍民關係中的若干問題，新華社編：《內部參考》第 2073 號，1956 年 12 月 8 日，第 158~163 頁；〈志願軍與朝鮮人民關係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內部參考》1957 年 1 月 22 日，第 2111 號，第 427~429 頁。

<sup>83</sup> 毛澤東與米高揚談話記錄，1956 年 9 月 18 日。

<sup>84</sup> 《人民日報》1954 年 9 月 9 日，第 1 版；《人民日報》1955 年 3 月 26 日，第 1 版；《周恩來年譜》上卷，第 562 頁。

<sup>85</sup> 蘇聯駐中國大使館 1956 年度報告，1957 年 4 月 18 日，АВІРФ, ф.5, оп.28, п.103, д.409, л.139~143；謝皮洛夫呈蘇共中央的請示，1957 年 1 月 4 日，沈志華、李丹慧搜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 11 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存，未刊，第 2810~2813 頁。

國不敢妄動。這個建議令金日成感到驚訝，一時沒有反應過來，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謝，認為如同毛澤東所說，這樣做可以給美國施加壓力。金日成回國立即召集會議討論，隨即兩次給毛澤東發電，表示勞動黨中央贊成志願軍回國，並提出了具體實施辦法。最後雙方商定，朝鮮政府首先發表聲明，要求雙方撤兵，中國政府再表示響應和支持，然後開始單方面撤軍，至1958年底志願軍全部撤離朝鮮。1958年1月8日，周恩來向蘇聯大使通報了這一情況。<sup>86</sup> 1月16日蘇聯外交部答復，這一舉動“非常英明”。<sup>87</sup> 於是，2月5日朝鮮政府發表聲明，要求一切外國軍隊同時撤出南北朝鮮，實現全朝鮮自由選舉，實現南北朝鮮和平統一。2月7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響應朝鮮的和平倡議，準備同朝鮮協商撤出志願軍，要求美國和其他有關各國也採取措施從南朝鮮撤軍。不久，蘇聯政府也發表聲明，支持這一建議。<sup>88</sup>

1958年2月14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朝鮮，商討撤軍的具體步驟和其他事宜。雙方確定，從3月至年底，分三批實現全部撤軍，並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朝鮮問題應由朝鮮內部通過談判解決，無需外國干涉。此後，第一批部隊六個師共八萬人，從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第二批六個師及其他特種部隊共十萬人，從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志願軍總部、三個師和後勤部隊共七萬人，從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志願軍撤退時將營房、設

---

<sup>86</sup> 周恩來接見尤金談話紀要，1958年1月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828-01，第4~7頁；尤金與毛澤東會談備忘錄，1958年2月28日，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86~96；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4期，第30頁。

<sup>87</sup> 駐蘇使館致外交部電，1958年1月16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813-01，第1~2頁。

<sup>88</sup> 《人民日報》1958年2月6日、2月7日，第1版、2月22日，第5版。



備和物資全部無償地移交給朝鮮人民軍。<sup>89</sup> 至此，在朝鮮作戰和駐守八年之久的中國軍隊，終於全部撤退回國，此舉無疑進一步加強了中朝之間的友好關係。<sup>90</sup>

無論如何，到 1958 年底，在朝鮮形成了金日成一統天下的局面，八月事件的陰影也雲消霧散，中朝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 十、金日成左右逢源與《中朝同盟條約》的簽訂

1958 年，中蘇之間在對內和對外政策層面的重大分歧開始在“大躍進”、人民公社、炮擊金門和中印邊界衝突的問題上顯現出來。1959~1960 年，赫魯曉夫撕毀核武器援助協定、中蘇領導人當面發生激烈爭吵、中共在世界工聯會議向蘇共的理論和方針提出公開挑戰、蘇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組織對中共的圍攻，特別是蘇聯政府突然全面撤退在華專家，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蘇關係已經惡化，中蘇同盟開始走向破裂。<sup>91</sup> 顯然，在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鬥爭中，中蘇兩黨都需要爭取得到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各黨的支持，其中當然包括朝鮮勞動黨在內。

中國對朝鮮的經濟援助是在面臨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所造成的嚴重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1960 年 10 月，中朝簽署了貸款協定、

---

<sup>89</sup>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第 1370~1370 頁；《人民日報》1958 年 2 月 21 日，第 1 版、1958 年 10 月 18 日，第 4 版；安東諾夫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報告，1958 年 7 月 26 日，ЦХСД，ф.5，оп.49，д.135，л.1~75。

<sup>90</sup> 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和分析辦公室當時全面分析了中國撤軍的動機，然而所談四個原因，沒有一個說到問題的實質（見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for the Far East, Intelligence Report: “Implications of Communist Chinese Withdrawal from North Korea”, March 17, 1958, MF2510409-0073,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sup>91</sup> 詳見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新華出版社 2007 年，第 222~295 頁。

延期還款換文及供應成套設備和提供技術援助的協定。李周淵副首相對此深表感激說：“中國人民對朝鮮人民的兄弟般的深情厚誼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sup>92</sup> 金日成後來稱讚說，朝鮮七年計劃的前期將有重點地發展手工業和輕工業，而中國援助的 18 個工廠都是輕工業，這些工廠投產後幫助朝鮮解決了很大問題。<sup>93</sup> 此外，中國領導人從自身與蘇交往的感受出發，在處理雙邊關係時，比較注意朝鮮方面的民族感情。1959 年 2 月 13 日，毛澤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整理的一個對外關係材料中特意加了一句話：“過去有些同志對朝鮮同志看缺點較多，看成績較少，犯了片面看問題的錯誤。”<sup>94</sup> 對於 1960 年 10 月中朝兩國足球賽中發生群眾噓朝鮮裁判事件，周恩來專門對國家體委有關部門提出批評，還指示要向群眾進行深入教育。<sup>95</sup> 還有，對於朝鮮報刊刪改中方國慶稿件一事，中國也採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sup>96</sup> 最重要的是，中國採取的對美強硬立場，比之莫斯科的緩和路線，更加符合平壤的需要。1960 年 5 月赫魯曉夫熱衷的四國首腦會議的流產，在世界上引起震動，時局驟然緊張起來。金日成特意跑到杭州來聽取毛澤東的意見，還抱怨說，赫魯曉夫 1955 年就叫他們不要反對美帝國主義。<sup>97</sup> 這恐怕是朝鮮面對中蘇分歧而表現出對華友好和親近的主要原因。

---

<sup>92</sup>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 355~356 頁；中國外交部檔案館，204-00432-01，第 1~3 頁；《人民日報》1960 年 10 月 15 日，第 1 版。

<sup>93</sup> 周恩來與金日成談話記錄，1961 年 7 月 11 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201-01451-01，第 1~12 頁。

<sup>94</sup>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8 冊，第 41~43 頁。

<sup>95</sup>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 371 頁。

<sup>96</sup> 對外文委、外交部致駐朝使館電，1960 年 11 月 17 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6-00498-07，第 51 頁。

<sup>97</sup> 毛澤東與金日成談話記錄，1960 年 5 月 21 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第 1075~1076 頁。

在此期中蘇之間發生分歧的各個方面，朝鮮都採取了或明或暗支持中國的態度。例如，在中印邊界衝突中，與蘇聯的中立立場不同，朝鮮各報公開表示支持中國，指責衝突的責任在印度一方，要求按照中國的方案解決問題。<sup>98</sup> 對於中國的“大躍進”和經濟建設總路線朝鮮也是一貫持讚揚態度，認為中國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是中共和毛澤東正確領導的結果。甚至到 1961 年中國經濟已陷入困境，朝鮮領導人仍然堅持認為中國的路線和政策是正確的，並表示支持中國的對內對外政策。<sup>99</sup> 特別是在 1960 年 11 月的莫斯科會議上，中蘇兩黨雖然有意緩和雙邊關係，但又都各持己見，於是發生了激烈爭論。<sup>100</sup> 無論是在討論宣言草案的預備會上，還是在正式會議的發言中，朝鮮與阿爾巴尼亞、越南、日本等國代表公開支持中共的觀點，並從各自的角度批評了蘇共的觀點和做法。這次會議之所以能夠達成基本一致的意見，除了中蘇雙方抱有和解的態度外，朝鮮等國代表明顯地站在中國一邊，而避免了布加勒斯特會議集體圍攻中共的局面，也是一個重要原因。<sup>101</sup>

莫斯科會議前後，朝鮮對華友好的態度更加明朗，在國際政治鬥爭中也更加趨向於同中國密切配合，一致行動。如再次掀起的反對事大主義和教條主義、樹立主體思想的運動，其教育和宣傳的內容主要是反對盲目學習蘇聯，照搬蘇聯的經驗，提倡向中國學習，發揚自己

---

<sup>98</sup> 《人民日報》1959 年 9 月 14 日，第 3 版；《人民日報》1959 年 11 月 27 日，第 5 版。

<sup>99</sup> 《人民日報》1960 年 1 月 25 日，第 6 版；喬曉光致外交部電，1960 年 3 月 8 日，駐朝使館致外交部電，1961 年 3 月 21 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6-00577-04，第 60~61、62~63 頁。

<sup>100</sup> 關於這次會議的研究，詳見李丹慧：〈最後的努力：中蘇在 1960 年代初的鬥爭與調和〉，《社會科學》2006 年第 6 期。

<sup>101</sup> 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16~19 頁；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第 562、568、573~576、598~599、616~617 頁。

的特點。同時，在報刊上大力強調反對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指出修正主義是當前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主要危險。<sup>102</sup> 在此基礎上，中朝之間更加緊了在外交領域的配合行動。1961年4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邀請南北朝鮮代表參加聯大討論朝鮮問題的議案，朝鮮政府有意派代表出席，但考慮到1956年中朝曾在這一問題上發生分歧（見前文），故事前徵求中國的意見。中國政府表示原則同意朝鮮的立場，但也明確提出三點修改意見。朝方對此表示感謝，並按照中方意見修改了外務省的聲明稿。<sup>103</sup> 中朝之間的友好合作，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朝鮮也注意保持同蘇聯的友好關係。莫斯科的吸引力主要在經濟方面，而蘇聯的經濟實力和援助力度一般都大於中國。1959年3月17日，蘇朝簽訂了新的經濟合作協定。為此，蘇聯將向朝鮮提供價值五億盧布的各種機器設備和技術幫助，以協助建設一座20萬瓩的火力發電站、化工廠、麻紡廠和毛織廠，以及擴建金策製鐵所和平壤絲織廠。1960年10月，蘇朝簽署協定，免除朝鮮政府償還所欠總數為7.6億盧布的貸款。12月24日，蘇朝又簽訂了經濟合作和貿易兩個協定，蘇聯將幫助朝鮮新建和擴建鋼鐵廠、火電站和煉油廠，並計劃在今後五年中將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增加80%。<sup>104</sup> 1961年5~6月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柯西金（A.N. Kosygin）訪朝，把

---

<sup>102</sup> 駐朝使館的報告，1960年12月28日，1961年1月17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6-00579-03，第124~135頁；駐朝使館的報告，1960年12月28日，1961年1月17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3052-06，第8~21頁。

<sup>103</sup> 喬曉光致外交部電，1961年4月14日，外交部致喬大使電，1961年4月16日，喬曉光致外交部電，朝鮮政府的聲明，1961年4月17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6-01361-03，第41~42、48、49、51~53頁。

<sup>104</sup> 《人民日報》1959年3月19日，第4版；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1946~60年代初）》第6卷，盛曾安等譯，東方出版社1986年，第728頁；駐朝使館的報告，1961年1月17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3052-06，第8~21頁。

蘇朝關係推向高潮。<sup>105</sup> 在這樣的背景下，便出現了朝鮮與蘇聯和中國同時簽訂友好條約的情況。

柯西金回國後，6月24日朝方公佈了金日成將率領黨政代表團訪蘇的消息，26日朝外相約見喬曉光大使，主動介紹了朝蘇準備簽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情況。蘇朝簽訂條約是1959年就談好的，後來因赫魯曉夫訪朝推遲而耽擱下來。鑒於中方此前也有意與朝簽約，喬就此機會談到中朝兩國締約的必要性。28日金日成即約見喬曉光，表示朝方完全贊成締約，“而且時間越快越好”，並主動提出在訪蘇後直去北京簽約。第二天中方便通知朝鮮，熱烈歡迎金日成訪蘇後於7月10日訪華，並簽訂《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sup>106</sup> 隨後，朝方將蘇朝條約的草案交給中方，並建議條約和公報均由中方提出，雙方商量。<sup>107</sup> 中國在對金日成訪華的接待和宣傳工作進行周密安排的同時，參照蘇朝條約和中蘇條約，起草了中朝條約。條約規定了中朝兩國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全面合作互助的關係，其中“一個重要特點是具有軍事同盟性質”。<sup>108</sup> 對於中方起草的聯合公報，朝方也完全同意，只是要求增加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讚揚和對朝鮮援助的感謝等內容。<sup>109</sup>

---

<sup>105</sup> 詳見《人民日報》1961年6月8日，第6版。

<sup>106</sup> 外交部致國務院報告，1961年7月8日，喬曉光致外交部電，1961年6月2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4-00206-01，第16~21、1~2頁。

<sup>107</sup> 駐朝使館致外交部電，1961年6月29日，7月4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4-00206-01，第3~5頁、204-00765-03，第27~28頁。

<sup>108</sup> 外交部關於朝鮮黨政代表團訪華的宣傳通知，1961年7月8日；外交部致國務院報告，1961年7月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201-00761-05，第54~57頁；外交部致國務院報告，1961年7月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4-00206-01，第16~21頁；蘇朝條約和中朝條約文本分別見《人民日報》1961年7月8日，第5版和7月12日，第1版。

<sup>109</sup> 中朝聯合公報中方草稿和定稿及情況說明，1961年7月14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204-01456-01，第1~8頁、13~18頁。

1961年7月10~15日，金日成在中國受到熱烈和隆重的歡迎，雙方對這次訪問都十分滿意。周恩來說：《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以法律的形式把我們兩國人民用鮮血結成的戰鬥友誼加以肯定”，金日成則指出：條約為兩國人民在長期鬥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兄弟友誼和同盟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新的基礎”。<sup>110</sup> 中國駐朝使館根據對朝鮮報紙報道金日成這兩次訪問的分量和語氣，以及朝鮮幹部的談話分析，認為對中國“似更親切一些”。<sup>111</sup> 這個判斷固然不錯，中朝關係也確實邁上了新臺階，但朝鮮的收穫絕不僅僅是加強了與中國的關係，並以同盟條約的形式解除了志願軍撤軍所造成的三八線軍事防禦方面的壓力。實際上，通過對中國和蘇聯的等距離外交，金日成不僅鞏固了他在黨內和國內的地位，而且感到自己已經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以至朝鮮勞動黨第四次代表大會認為：三大提出的加強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友誼團結的任務已經完成，特別是這次金日成率團訪問蘇、中，在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團結方面起了劃時代的作用。<sup>112</sup>

## 簡短的結論

深入研究中朝關係（包括蘇朝關係），對於解讀冷戰時期乃至後冷戰時期東亞的政治結構和及其發展趨向，探討朝鮮半島危機產生的根源及解決途徑，都具有決定性意義。從以上對歷史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在冷戰背景下，中朝同盟本質上是一種“政治聯姻”，而非

---

<sup>110</sup>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423~424頁；《人民日報》1961年7月13日，第1版。

<sup>111</sup> 駐朝使館致外交部、中聯部電，1961年7月2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201-00761-01，第91~94頁。

<sup>112</sup> 駐朝使館致新華總社等電，1961年8月2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6-00578-03，第19~21頁。

雙方宣傳的或人們在表面上看到的那種“唇齒相依”的自然聯盟。

中朝關係屬大國與小國的關係，受歷史和地理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這種關係曾處於朝貢體系之中，所謂“唇齒”聯盟、“鮮血凝成的友誼”，蓋源於此。戰後，特別是冷戰出現後，中朝關係便進入了新的國際體系。面對現代中朝關係，毛澤東既有一種傳統的中央大國的統治者心態——對周邊小國都要寬容並給以保護，又有一種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心態——對亞洲社會主義國家有責任給予幫助和支援。對於毛澤東而言，中朝同盟的立足點就是亞洲革命的利益及中共對國際共運的領導權。所以，儘管朝鮮戰爭是中國被迫接受的既成事實，他仍然不顧個人屈辱和國家安危，毅然決定參戰；而當中共需要朝鮮黨支持的時候，他不僅容忍了金日成對延安派的打擊和迫害，還要向朝鮮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

面對複雜的國際環境，小國無疑需要大國的保護。中朝同盟對於金日成而言，是維護國家安全和他本人統治的工具。於是，在危急關頭，他只能承認陣營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理念，忍受國家主權和個人尊嚴遭受侵犯的現實。當國際鬥爭的中心轉移之後，作為革命陣營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朝鮮巧妙地利用中蘇之間的矛盾和分歧，左右逢源，以求生存和發展。在兩個大國夾縫中的小國，或兩邊受氣，或兩面得利，金日成屬於後者。這裡的關鍵在於小國的戰略地位及其領導人的政治藝術水平。金日成適時地提出了朝鮮獨立發展的“主體思想”，其矛頭所指，不僅是莫斯科，也包括北京。

除此之外，在國際關係體系中，中朝關係說到底屬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故也體現出這種同盟關係的本質特徵，即內在的不穩定性和多變性，而這一現象的根源在於社會主義同盟關係中固有的兩種結構性弊病。其一，在共產黨的傳統理論中，本來就沒有國家和主權的概念，即使掌握了政權，但黨內和陣營內部通行的最高原則還是國際主

義；其二，在共產黨的組織觀念中，本來就沒有平等的概念，奪取政權以後，黨際關係中領導和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被移植到國家關係中。儘管隨著時間推移，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也逐步意識到國家利益應該是處理相互關係的政治準則，但是卻沒有人能夠否定以往奉行的那些基本原則，因為一旦這樣做，就等於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否定了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sup>113</sup> 或許，這就是中國和朝鮮在處理他們相互關係時所遇到的邏輯上的悖論。

---

<sup>113</sup> 筆者以中蘇關係為例對此有詳細論述，參見沈志華：〈中蘇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結果〉，《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9~42頁；沈志華：《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第466~475頁。